

Rural Governance under Cultural Discontinuity: Why are local youth "absent"?-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N City, Henan Province

^aZhouzheng Li

^aSchool of Social Affair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28 April 2024, Revised 03 August 2024, Accepted 01 November 2024

Abstract

Purpose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cultural discontinuity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w willingness among rural youth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Based on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disconnection—identity erosion—participation weakening," using City N in He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dual disconnections between moder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ulture affect youth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Findings – This paper studies that these dual disconnections erode young people's emotional, value, and identity attachments to rural areas, leading to three transmission pathways: "cultural conflict—identity weakening—participation indifference," "social disconnection—resource scarcity—participation obstruction," and "rule opposition—legitimacy skepticism—participation withdrawal."

Research Implications – In the management of this paper, this study deeply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absence of local youth in rural governance, provides new ideas and solutions for breaking the gap between youth and rural governance and reconstructing the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youth and rural areas, and helps to ensur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Cultural Rupture, Local Youth, Rural Governance, Rural Identity, Participation Weakening

JEL Classifications: Z13,R23,J61

^a First Author, E-mail: 2369513184@qq.com

© 2023 The NLBA Eurasian Institut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I. 引言

乡村振兴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繁荣老村经济的关键（Zhaojun Meng 等人，2024）。乡村振兴，而其中关键在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需要多措并举，培养造就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人才。目前在乡村治理中，依然存在治理结构不合理、青年参与意愿低等问题。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经历着剧烈的文化变迁，“文化断裂”现象愈发显著。本文围绕“文化断裂”这一核心概念展开，深入探讨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出现的文化解构现象，以及其对在地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本文期望能从文化视角切入，深度揭示乡村治理中在地青年缺位的内在逻辑，为打破青年与乡村治理之间的隔阂、重构在地青年与乡村的治理关联提供全新的思路与解决方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

II. 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既有研究及反思

1. 制度主义视角：

强调治理结构与政策供给的作用。聚焦国内研究，袁金辉、乔彦斌（2018）发现乡村治理存在制度保障不足、参与渠道狭窄等问题，王红卓、朱冬亮（2021）主张通过流程再造、技术赋能（如大数据应用）提升青年参与。已有文献详细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进，分析了各阶段制度对治理的影响。李梅（2021）探讨了当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如乡村治理制度执行低效等问题。同时廖志辰（2021）阐述了青年人才通过制度嵌入参与乡村基层工作的情况，国家从顶层设计保障选调生参与乡村治理的合法身份，以及制度嵌入对乡村治理的成效和影响。国外研究则关注民主制度、社区服务对青年参与的影响，认为制度环境与主体赋能存在联动效应。在主体赋能层面，强调出青年创新能力对城乡融合的适应性价值，其次从乡村振兴层面探析乡村变革对个体生活的深层影响，得出指出区域繁荣需依赖群体协同的结论。

2. 文化主义视角：

关注价值观念与社会认同的作用。黄博琛（2022）从文化层面强调文化氛围薄弱与自治机制缺陷是在地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关键障碍；王兆萍（2007）提出文化断裂会引发制度失意、制度创新和制度排斥等现象，体现了文化对制度选择和乡村发展模式存在影响；吴宗友（2017）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断裂问题，以及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强调重建社会转型的人文基础的重要性。但既有研究对乡村文化断裂的具体维度及其对青年认同的影响机制尚未充分展开讨论。

3.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研究方面均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既有研究的局限在于：其一，侧重宏观制度分析，忽视了微观文化心理机制；对于制度在乡村治理青年参与中的作用分析较为深入，但在制度的动态调整和适应性方面研究不足，制度的实施机制和监督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二，对青年群体的主体性关注不足，未揭示文化断裂如何通过认同消解影响青年参与行为。已有研究群体多为乡村弱势群体，即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群体多为老年人与妇女群体。实际上，在地青年也应是乡村治理参与的关键组成，而现有研究对青年群体关注不足。本文引入“文化断裂”概念，以N市作为案例对象，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双重断裂出发，构建“文化断裂—认同消解—参与弱化”的分析框架，尝试挖掘背后所隐含的影响机制，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缺口。

III. 研究呈现：在地青年的文化困境及其生成机制

本文基于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案例剖析与文本分析，系统揭示了双重文化断裂现象的内在机理与多元表现形态，为文化断裂理论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质性证据。本文归纳出：“文化断裂”对于在地青年不愿意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二是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断裂（孙立平，2003）。

1. 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价值断裂

1.1 从“安土重迁”到“逐梦都市”的生存选择

在当代社会，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青年群体中有着鲜明的现代演绎，这与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之间形成了显著的张力。80%的受访者将关注重点聚焦于经济收益与职业前景，这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乡土责任”观念产生了明显的断裂（韩玉祥，2021）。通过深入访谈发现，青年群体普遍持有“参与乡村治理对个人发展帮助不大”的观点，这一现象深刻凸显了青年自我实现需求与传统责任意识之间的激烈冲突。从社会学理论视角来看，这种冲突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价值体系的重构与碰撞，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使得青年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与成就，而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所强调的对乡土的责任和奉献在这一背景下受到了冲击。

1.2 从“差序格局”到“原子化社交”的关系重构

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村“差序格局”，在当下青年群体中正演变为“线上圈层”。互联网时代的线上社交方式与乡村传统差序格局下的线下社交模式之间形成了明显的代际鸿沟。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来看，线上社交打破了传统社交的时空限制，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社交关系网络，但同时也削弱

了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传统乡村社交关系（高卫星、张慧远，2021）。这种变化使得在地青年在参与乡村治理时，难以借助传统的社交资源和关系网络，从而影响了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2. 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内在冲突

2.1 从“集体主义”到“自我实现”的目标位移

集体主义曾是乡村治理的核心价值，在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当代青年在乡村治理中更倾向于注重个人目标的实现。集体主义导向的乡村治理目标，诸如公共事务协调、集体资源分配等，与青年个体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这直接导致在地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严重不足（李成龙，2020）。从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理论角度来看，个体在行为决策过程中往往会基于自身的目标和利益进行优先考量。当乡村治理目标与青年个体目标不一致时，青年会认为参与乡村治理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从而降低参与的积极性。

2.2 从“义务奉献”到“成本核算”的理性选择

传统乡村的“义务治理”模式，在现代青年的成本收益计算中难以为继。在当前乡村治理中，个体理性算计逐渐替代了集体奉献精神。在进行访谈过程中，“有偿参与才愿意，无偿参与没动力”的功利化心态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反映了集体文化中“义务奉献”的传统规范与现代个体利益诉求之间的断裂，使得乡村治理参与缺乏内在的驱动力。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来看，个体在参与社会活动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乡村治理中，如果青年个体认为参与治理的成本大于收益，且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来弥补这种差距，他们就会选择减少或放弃参与。

IV. 研究分析：从文化断裂到参与弱化的传导路径

借助 Nvivo-12 工具对访谈文本的深度扎根分析，本文清晰梳理出文化断裂影响在地青年参与意愿的具体路径。

1. “文化冲突→认同弱化→参与冷漠”链：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传统乡村价值体系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最为典型的便是个人发展与集体责任之间的矛盾（崔玲玲，2021）。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青年个体更加注重个人职业发展、经济收入等自我实现目标，而传统乡村强调集体利益优先、互帮互助的集体责任观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文化冲突首先导致在地青年对乡村既有的价值体系认同逐渐弱化，他们不再将乡村传统价值观念作为行为准则和判断依据。“我觉得我们村里就是那种做什么都要靠关系的，后来我就渐渐不愿意参加了，最后还是选择外出务工”（被访对象汪女士在实地访谈中所说），

这便是这一路径的生动体现。随着在地青年对乡村价值体系认同的弱化，在地青年对乡村治理事务表现出明显的冷漠态度，不再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

2. “社交断裂→资源缺失→参与受阻”链：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线上社交成为青年个体主要社交方式之一，这对传统乡村基于地缘、血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造成了巨大冲击（宗成峰、朱启臻，2020）。在费孝通先生笔下传统的差序格局中，乡村社会关系紧密，邻里之间相互信任，信息传播主要依靠口口相传的代际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可为在地青年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如信任关系、信息渠道等。然而，线上社交的盛行打破了传统社交的时空限制，使在地青年社交范围虽得以扩大，但社交关系趋于表面化、松散化、冷漠化。“俺知道那个目前的村电商项目还挺火咧，也有心参与参与，但俺哪有认识的人哎，没有人介绍，没有村里面大队的人介绍弄不成，后来不就放弃了吗？”（被访对象李先生在实地访谈中所说），这充分说明线上社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在地青年在乡村治理中丧失了必要的社会资源，进而阻碍了他们参与乡村事务的实际行动。

3. “规则对立→合法性质疑→参与退出”链：

乡村传统治理规则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惯性和地域特色，但部分规则可能存在与现代法治精神、民主理念相悖的情况（费广胜，2021）。部分青年群体接受现代教育，具有较强的民主法治意识，当他们发现乡村治理规则存在不合理之处，如村规民约修订不透明、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时，便会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合法性产生质疑。“有时候吧，我发现那些颁布的村规民约修订其实并没有公开，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也不行，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并没有把村民的利益看得很重，所以我个人也不会去参与这种没意义的事”（被访对象张女士在实地访谈中所说），这种对治理体系合法性的质疑直接导致在地青年主动退出乡村治理参与，使乡村治理失去了在地青年群体的活力与支持。这种传统规则与现代法治的对立，呈现出来的即是在地青年对于乡村治理参与意愿的逐渐式微。

V. 对策与建议

1. 完善激励机制：政策支持激活治理内生动力

实施参与绩效量化考核，建立治理绩效与发展资源挂钩机制，对青年在乡村治理中的工作表现、创新举措、实际成效等进行科学评估，实施治理绩效与资源获取正向关联，通过政策、技术手段多措并举建立长效激励。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特性记录青年在矛盾调解、活动组织等治理行为，生成“贡献积分”，明确将贡献积分纳入村集体收益分配机制，将积分与宅基地分配、子女入学等福利挂钩，形成“多劳多得”的治理生态。优化青年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入

乡创业的意见》，从资金、技术、场地等多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依据《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升青年创业贷款额度，同步推广“创业失败补偿险”，设立返乡创业专项基金；组织农业、科技等领域专家与返乡创业青年结对帮扶，提供技术指导与咨询服务；建设返乡创业园区，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办公场地、生产设施等硬件支持。

2. 促进代际合作：“以老带新”实现代际社交融合

传统乡村社会依赖宗族网络与面对面协商的治理模式，与青年群体惯用的数字化、契约化社交方式形成结构性冲突，代际文化断裂导致的社交模式差异，已成为制约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关键障碍。为此，需构建代际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制度性对话平台”与“文化转译机制”实现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技术的有机融合。一方面，依据《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建立“跨代际治理委员会”，既保留乡贤“情理化约”的传统调解方式，又引入青年主导的区块链合同存证技术，形成“情理—法理”双重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依托《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开发“代际文化转译数字平台”，通过 AI 技术将方言俗语、传统谚语转化为标准化治理术语，并建立“老带新”技能传承积分制度，鼓励青年向老一辈学习农耕技艺、民俗礼仪，将其纳入乡村治理人才考核体系，促进传统—现代社交模式融合，消解代际认知鸿沟，激活传统治理资源在现代语境下的新生命力。

3. 重构教育体系：改革机制培育新型复合人才

文化断裂造成的代际断层、传统乡村发展目标导向模糊化等问题，极大的影响当代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素养和能力。面对现有教育体系与乡村治理实际需求脱节的现状，必须切实推进职业教育课程模块化转型，打破传统教育壁垒，培养“治理+技能”双核人才。依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要求，在职业院校开设“乡村治理实务”“文化遗产保护”等模块化课程，对接教育部“1+X”证书制度；推行“课堂+田间”双导师制，加强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的融合，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同时，强化在地人才培养与回流机制。依据《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搭建乡村人才信息平台，促进人才与乡村的精准对接；建立乡村人才培养基地，定期组织在地青年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基层治理能力培训；建立“返乡人才库”，通过政策倾斜吸引在外求学、工作的青年人才回流，形成人才汇聚乡村、服务乡村治理的良好局面，修复文化断裂对乡村人才结构造成的破坏。

VI. 结论

通过分析河南省 N 市 F 县在地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基本情况，本文对“乡村治理中青年治理‘缺位’”这一现实问题做出回应。本文揭示出乡村治理中在地青年治理缺位的文化机制——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双重断裂。从当代在地青年的生存选择、关系重构、生活差异，结合质性访谈资料文本，诠释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深层含义。而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断裂则是从在

地青年的目标位移、理性选择、身份转换三方面结合访谈文本展开具体论述。基于对文化断裂生成机制的深度剖析,本文发现,文化断裂的形成受到宏观驱动与微观变迁的双重因素的影响。具体来看,宏观层面的城市化“虹吸效应”与微观变迁的乡村社会“空心化”与代际传承“中断化”是导致文化断裂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本文从完善参与激励机制、促进代际合作、重构教育体系三方面尝试给出可能优化路径,助力实现乡村人才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参考文献

- Zhaojun Meng Yabing Han Kabwon Kang.(2024).Study on the Dilemma and Realisation Path of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Rural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juvenation.Journal of Advanced Academic Research and Studies,1(7).
- 崔玲玲,“人民调解制度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之契合”,《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02):133-142。
- 费广胜,“农业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作用机制探析”,《行政论坛》,2021,28(02):99-105。
- 高卫星,张慧远,“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策略”,《中州学刊》,2021(02):7-12。
- 韩玉祥,“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新困境及其突围——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02):48-56。
- 黄博琛,“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出路”,《农业经济》,2022(01):83-85。
- 李成龙,“从缺场到回返: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究”,《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3(05):10-15。
- 李梅,“新时期乡村治理困境与村级治理‘行政化’”,《学术界》第2期,2021(02):87-96。
- 廖志辰,“嵌入式治理视角下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治理现状分析”,《甘肃农业》,2021年。
-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王红卓,朱冬亮,“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01):89-95。
- 王兆萍,“文化断裂与制度边缘性效应——关于崖口村制度变迁的一种解释”,《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
- 吴宗友,“文化断裂中的中国社会转型”,《江淮论坛》第1期,2017年。
- 袁金辉,乔彦斌,“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行政论坛》,2018,25(06):19-25。
- 宗成峰,朱启臻,“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5):1-8。